



美国透视

——个人主义的困境

〔美〕罗伯特·贝拉 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017 7016 4

美国透视

——个人主义的困境

〔美〕 罗伯特·贝拉，理查德·麦德森，
威廉·M·萨利文，安·斯威德尔著
史蒂文·M·蒂普顿
张来举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1992

(京) 新登字028号

HABITS OF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by Robert N. Bellah, Richard Madsen, William
M. Sullivan, Ann Swidler, Steven M. Tipt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本书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译出

美国透视

——个人主义的困境

〔美〕罗伯特·贝拉 等著

张来举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 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7.5印张 193千字

印数0001—3000

1992年2月第一版 1992年2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289-9/G·50 定价: 4.9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怎样生活？该怎样生活？我们是何许人也、其品格又是什么？我们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问的就是这些问题。大家拉开话题，以社会为背景，谈家庭，道忧虑，论生活。我们发现，关于如何生活、如何教育孩子，关于社会责任和个人权力，人们乐于各抒己见，却又因之流露出些许的灰心丧气。问题于大家至关重要，但伦理问题的探讨又常常被置入私人忧虑的王国。似乎使其公开化就会使人尴尬或者难堪。我们真切地希望，本书将帮助人们把常常只在亲朋好友间展开的内部争论公诸于世，使其变为公开的讨论。在本书的字里行间，美国人与我们娓娓相叙，又以我们为中介与读者探讨大家都很关切的问题。许多人怀疑我们有足够的共同点来相互抒发壮志豪情、表露忧虑与恐惧。读完此书，于掩卷沉思之后，他们就会相信：有的。

此书探讨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保持或者创造一种在伦理道德上富有条理的生活方式。但是，希望何种生活，则取决于是何种人民——取决于我们的品格。所以，我们的探究，将是不厌其烦地讨论品格和社会的关系。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社会哲学家托克维尔全面而又深刻地分析过美国内部品格与社会的关系。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基于和美国人的广泛讨论，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描述了美国人的道德态度——他有时称其为“心灵的习性”，并表明这些道德态度如何在美人品格的形成中发挥作用。在洋洋万物之中，他选出家庭生活、宗教生活、以及对地方政治的参与，认为正是这些东西造就一种能够联系更广大的社团、从而最终支持自

由宪法之存在的人。他还告诫人们，我们品格中的某些方面——即他首次称作“个人主义”的东西，可能最终导致美国人的相互孤立，从而破坏自由赖以存在的条件。

本书探讨的中心是美国的个人主义问题。托克维尔对它的描绘，流露出赞美与担忧交织的心情。我们认为，在美国社会中源远流长的是个人主义而不是托克维尔所以为的平等观念。我们十分担心这种个人主义会变得象癌症一样令人望而生畏、退避三舍——它可能破坏托克维尔视之为能够弱化社会中破坏性更大的潜力的社会保护层；它还可能威胁自由本身的存在。我们迫切想要知道，个人主义在美国的表现是什么，人们感觉它象什么，如若从个人主义的立场看，这个世界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面目。

我们还有兴趣于一些文化传统和文化实践。这些传统和实践能够在不毁灭个体性的前提下，限制个人主义具有破坏性的一面，从而提供美国人可能接受的其它生活模式。我们迫切想要知道，从托克维尔时代至今，这些传统与实践的进展如何，其复兴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一方面，我们的着眼点是人们说些什么，与此同时，我们又十分清醒地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往往难以用语言表达。就是说，自己如何生活与自己的文化允许自己如何说发生了矛盾。正是在这种矛盾之中，我们发现关于社会所面临窘境的远见卓识；同时又有希望重新修订一种用以讨论社会困境的共同语言。

我们在托克维尔的启示下相信，解开自由制度得以存活下来之奥秘的有效途径之一，是考察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亦即探讨公民参与（或者不参与）公共生活世界的方式。因此，我们决定重点研究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在美国是如何进行的：看看私人生活在什么范围内促使人们进入公共生活世界以及在什么范围内鼓励人们只在私人生活圈内寻找生活的意义，瞧瞧公共生活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满足我们的私人欲望，又在何种程度上使我们大失所望而不再参与公共生活。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部分 导 论	(1)
第一章 幸福梦寻	(1)
第二章 文化和品格：历史的对话	(17)
第二部分 私人生活	(37)
第三章 发现自我	(37)
第四章 爱情与婚姻	(61)
第五章 走出去	(83)
第三部分 公共生活	(107)
第六章 参与	(107)
第七章 公民资格	(131)
第八章 民族社会	(154)
第四部分 结 论	(179)
第九章 个人主义	(179)
第十章 改变美国文化	(206)
后记	

第一部分 导 论

第一章 幸福梦寻

布里埃·帕尔默

活得惬意，无异于一种挑战。布里埃·帕尔默以商为业，成绩卓著。他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级经理，住在圣何塞的市郊。在公司里的飞黄腾达，自然使他感到自豪；而最近他对成功的看法发生的重大改变，更加使他得意非凡。他说：“我离了婚，重新研究了生活的价值，价值系统变化很大。以前干工作不要命，常常半夜才回家。现在下班时间一到就不干。我现在才算明白，家庭比工作更重要，工作工作，去它娘的！”新的婚姻生活，一大群孩子已是布里埃生活的中心。但这种新的价值观，是在度过一个个难关、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后才获得的。

布里埃高高的个头，细条身材，浑身充满窃窃欲动的能量。青年时代，他无忧无虑，敢作敢为，风流倜傥，招花惹草，还花很多时间往腰包搂钱。24岁那年成家立业，肩负婚姻家庭的责任，踏上以孩子为生活主要目标的旅程。他一心一意追求事业上的成功、家庭责任方面的尽职。为了养家糊口，他干两份工作，毫无怨言地坐看青春年华悄然逝去。钱财短缺、入不敷出、妻子束手无策，他实在忍受不了。在他看来，价值系统中最崇高的品格是自立自存。那是第二种本能。渐渐地，夫妻之间共有的东西

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可谓和谐的性生活、孩子和事业。赡养家室至关重要，求共同点则无足轻重，夫妻一起共度时光也无足轻重。有一天，他下班回家，看到房子正在拍卖，妻子准备和他分道扬镳。

离婚一事，属于令布里埃最感震惊的事件之一。痛定思痛，布里埃重新评价了自己的生活，探讨了他刻意追求的那种成功的局限性。尽管妻子离他而去，尽管后来还发现妻子对他不忠，布里埃的反思时期仍然使他重新思考自己在家庭关系中的作用。他说：“我是解决问题的强手，我分析了这次失败。我特别具有竞争精神，不喜欢失败，总喜欢赢。于是，我回头考察问题的症结所在，结果发现，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对成功的向往、对失败的恐惧。”

不久之后，布里埃又和另一位女人喜结良缘。她也离过婚，带来四个孩子，和他的三个孩子一起，构成一个新的家庭。他们精力充沛，相互倾慕，富有责任心，家庭处处充满欢乐。他这时认为，“要能自由地接受感情，给予感情，和对方共享一切，目标共有，感觉同有，一道解决问题。夫妻应该互敬互爱，既能自由地给予，又能自由地接受。”

在许多方面，布里埃的成功史都是个人的成功史。他在物质上获得了成功，而且不失时机地超越物质上的成功，完全认识到了他究竟想从生活中获取什么。然而，尽管布里埃的生活表现出一种胜利，尽管他似乎经历了一种完善过程，但他的故事里仍然存在某种不确定的东西，存在某种显然未经解决的东西。事实上，布里埃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起因于喜好的改变，具有一定的随意性。美国文化传统确定个性、成就一种人生目的的方式，会让人悬浮于光辉灿烂却又令人心惊肉跳的孤独中。我们的文化，我们所继承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范畴，有各种局限性，而不是继承这种文化的个人——如布里埃——有什么局限性。人们遵循的生活目的，常常不能从理性的角度辩护，如我们在布里埃和许

多其它事例中所看到的那样。

布里埃那极不安分的精力，对挑战的喜爱，还有对高质量生活的欣赏，代表着美国文化中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所有这些品质，尤其适合充满竞争的共同世界。但是，当布里埃叙述他如何选择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时，他一再提起不为任何一般目的或信念框架所辩护的“价值”和“优先事项”。所谓的好事，也就是可以得到奖赏的事。喜好一变，好事的本质也跟着要变。即使最深层的伦理道德观，也属于个人喜好的范畴。确实，最终的伦理价值也不过是：个人应该追求他们觉得有益的东西，只要不干涉别人的“价值系统”就行。这个世界充满各式各样暗中对立的私人利益，在这里谁也不能说这个价值系统比那个价值系统更好。对于这样一个世界，布里埃非常重视一个基本原理——诚实和对话的重要性。正是借助于对话，人们才有机会解决相互间的差异，因为没有更庞大的道德理想体系供人解决争端之用，因为即使那些“绝对错误”的东西，如杀人、偷盗、说谎，可能也属于个人喜好的范畴。

有没有某些绝对错误的东西呢？布里埃说：“谁也不应该声称自己有资格给芸芸众生确立各种价值标准，尽管我很想说，如果世界的其余部分遵循我的价值标准生活，它将成为一个美好的世界。”他提供的辩护仅仅是：“对我的价值标准我极其满意。”然而，价值本身对布里埃来说却会越来越陷进个人喜好的范围，唯一的道德问题是做和喜好一致的事。奇怪的是，他日渐献身于照料家庭儿女，而不是关心物质上的成功，这似乎缺乏本质性的辩护。“我只是觉得，选择过程B比选择过程A能使我个人得到更多的满足。它使我的自我感觉更好些。要做成几件事，要创造点什么，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确实是一次挑战。相信我，这是一次挑战。兴许我正是因为这才兴致勃勃的，兴许正是因为这我才觉得它很重要。”

不错，布里埃对妻子透出绵绵柔情和满腔的倾慕，对孩子表

露出真正的献身精神，对自己则有着充满活力的自信。尽管如此，布里埃对自己生活的辩护，基础还是非常脆弱、不堪一击的。从伦理上讲，他的生活比他被野心统治的时候更为合情合理，但是听他讲话，即使最深层的献身于他人的动机，也不过是一时的欲望，没有任何坚实的基础。他无法解释什么是确定他生活意义的真正承诺，在这种情况下，承诺本身也是不稳定的。

乔·戈曼

对于布里埃·帕尔默关于成功的思想，乔·戈曼会称之为稚童呓语。孩子气意味着不懂得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意味着只知道揣摩从家中、从社会能获得什么，而完全不考虑能给予他们什么。对乔来说，所谓成功，就是达到家庭和社会所制定的目标，而不是利用家庭和社会来达到个人的目标。

乔·戈曼和布里埃·帕尔默年岁差不多，一直住在马萨诸塞的萨福克。这里人口不满两万，驱车一个半小时就可到达波士顿。萨福克建于1632年，就在我们采访乔·戈曼的六个月以前，该城庆祝了她的250岁生日。乔负责组织这次庆典，尽管原先人们并没有委派他。原先，镇长任命的庆典委员会由当地知名人士组成，但其中并没有乔。然而问题在于，这个委员会中间谁也不曾组织过这么庞大的庆典。若按乔的话说，更糟糕的是，这些人更感兴趣的是榜上有名，而不是动手干事。结果，庆典的第一件事就以惨败告终：偌大的公共宴会，上的食物只够应邀的一半人吃。乔·戈曼知道自己有能力组织这次庆典活动，并感到有责任对此竭尽全力。于是他毛遂自荐，参加了组织委员会，而且事实上（即使不是名义上）成了他们的头儿。

在乔的指挥下，周年庆典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庆祝活动延续了九个月。游行、音乐会、狂欢日、体育比赛、盛大宴会、舞会，一切都组织得有条不紊、尽心尽责。乔用下面的话道出了庆典的意义：“我们一起干，让尽可能多的人行动起来。”

在乔的词典里，“成功”是一个很重要的词，但从我们和他开始谈话到结束，这个词从没有指他为自己挣得的地位，甚至也毫不牵涉他获得的任何成就。在他那里，成功就是大家对同舟共济的经历，而人们的这种经历部分是通过他才获得的。“庆典之前，人们你争我吵，牢骚满腹，甚是棘手。但庆典一结束，全城都很赞赏。就是原来反对这反对那的人，也表示完全赞成下年再搞一次。真了不起，真是一次重大的成功，把全城的人都团结起来了。但功劳不归我，归萨福克这个大家庭，我只喜欢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

但这并不意味着乔不关心社会对他工作的奖赏。就在庆典结束的几个月之后，他被命名为萨福克一年一度的“模范公民”，城中商界政界的领导人为他摆酒庆贺。此外，他做的社会工作也有一笔进项。乔是城里一家大生产公司的公共关系顾问，帮助公司决定如何与居民们和睦相处，如何为城里的娱乐活动和慈善事业捐款出钱。这样，乔的工作就显然带有一定的博爱色彩。他甚至拒绝到总部工作。对他来说，在社会中的地位，比公司的位置更为重要。与居民的友谊让他长居萨福克并视此城为自己的家。

如此说来，乔和帕尔默不同。帕尔默以“优先事项”为基础决定生活的目标，乔则以家庭和社会的传统为参照决定什么是成功。为了确立萨福克传统的重要性，乔幻想出该城一个虚无飘渺的黄金时代，而现代的发展却毁掉了这个理想。他相信，这个时代的精神可以复兴，而复兴它的工作正创造着目前生活的价值。乔以为，他儿时所经历的自发而富有信任的欢乐已不复存在，部分原因在于城中迁来的新户被大城市波士顿的空气腐蚀了。地方政府生活中纷争四起、贿赂成风、腐化堕落。政治家只对自己在城里的投资感兴趣。对公共利益却不理不睬。此外，现代的教育体制又招致堕落。心理学家分析孩子，要他们做这做那，父母却又不给孩子约束，连自己都带有一身的孩子气。孩子需要管教，但受的却是各种心理训练。

但是，过去当然从来也没有象乔所忘情回忆的那样悠然然、纯洁无暇。即便就是这样，今天再要想使小镇与大城市隔绝，使学校的课程不受当代心理学的影响，从而返回过去，也是完全不现实的。乔对有价值生活的看法，似乎深深扎根于他所在社团的客观传统，而最终又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也许，他不得不藏起返回古代美好时日的愿望，因为即便实现了这种愿望，城中大多数人也会觉得荒唐可笑。此外，愿望实现后乔本人是否愿意在里面生活，恐怕也很成问题。

最后，委身于小城的价值观，会得出一种危险、狭隘的社会公正观。比如说，就在萨福克250周年庆典高潮过去两个月之后，全城在恼怒的群情中爆发一场地方沙文主义的闹剧。城房管局一直想为老年人修建低价房子。建这种房子，要从联邦政府那里申请拨款。政府拨500万美元建这种房子，同时规定必须为贫困家庭建一些低价套房。城里许多人担心这些套房会被来自波士顿的黑人和古巴人占据。在一次群情激昂的大会上，人们拒绝拨款，并投票表决罢免申请这笔款项的市政府官员。他们求助于传统悠久之社团的团结统一，为自己的种族隔离政策辩护。

乔·戈曼不赞成拒绝拨款。在他的特性中，有着慷慨豁达的一面，这使他对人们的少数居民恐惧症深感不安。但是，要返回神话般的过去，这种怀旧的渴望丝毫无助于理解萨福克是如何解决其现实问题的，更无任何框架可供他在更广大的社会背景中展开对萨福克的思考。

玛格丽特·奥尔德海姆

玛格丽特·奥尔德海姆是一位治疗学家，和乔·戈曼所抱怨的那些人差不多，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都是纪律的破坏者。她生活在一个稳定、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里，不过她还是会说，乔对充实生活的看法是不实在的，没有顾及人类本质与现代社会生活的现实。她会说，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经验千差万

别，如果你要严格依照自己的标准行事，那就得和别人一刀两断、彻底隔绝。对玛格丽特来说，对别人的宽容大度以及对从新经验中学习的渴望非常重要，而在乔刻意追求的那种结构严谨的同质化社会，这一切的相对缺乏会使她染上幽闭恐怖症，以至于最终无法忍受下去。这活脱脱就象有人宁愿永远舒舒服服地呆在子宫里而不愿走到亮堂堂的日光下一样。在她看来，个人的成功要高于对家庭和社会的依附。

玛格丽特三十刚刚出头，神态镇静自若、具有很强的纪律意识。她在学术方面出类拔萃，职业工作也是功劳卓著。努力工作，尽职尽责，尊重别人，这些都是父母双亲教给她的东西。但她却离父母而居，认为他们过份于刻板、过于“正人君子”，而她本人又喜欢以别人的本来面目来接受他们。对别人的宽容大度，使她比父亲更能与各种人和睦相处。生活使玛格丽特感到兴味无比，而对别人的兴趣、接受别人的能力，又引她步入治疗学领域。在各种人的挑战下，她的创造力一如泉涌、源源不断。观点的差异、经验的多样，使她的生活充满乐趣。她说：“治疗学家要关照病人、通过向病人学习而使自己成熟。我觉得，考察不同人的思想、观念、问题，寻找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好象揭示新的思想一样。每次看完病人回家，我都会重新考察一番我的世界观，因为您知道，每个病人都有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经历，这些东西无意于挑战却实在具有挑战的性质。”

在玛格丽特看来，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干自己选择的事情并尽可能把它干好。生活的意义在于简单接受世界本来的存在方式而不对它进行反思。想做的、喜欢做的，就是应该做的，不管它们碰巧是什么。象布里埃·帕尔默一样，玛格丽特也把“价值”看作给定的东西。她希望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帮助他人，在私人交往中给予爱、获得爱。要使生活充实、幸福而又美满，不花费心血、不付出代价是绝对不行的。

玛格丽特完全可以成为一位清醒而又成熟的辩护律师。作为

一位治疗学家，她无法解决人们的问题，而只能帮助他们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自己。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切合实际、也许更富有成效地对待生活，更好地认识个人的喜好。根据她的理解，人际关系需要给予——获取。为了获得生活的满足，人们必须努力工作，但最终还是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人们对他人提出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分离才是每个人不可避免的命运，即便是夫妻情结、父子关系，也无法克服这种分离。人人要对自己负责，父母也好，夫妻也罢，谁也承担不了这种责任，因为人人都要走自己的路。

可以看到，一方面，玛格丽特·奥尔德海姆的个人成功观牵涉到深厚的个人意识，对所存在差异的高度容忍，乐于接受对自己生命所负的责任；另一方面，她的信念所蕴含的一切也似乎相互矛盾。她是对自己负责，但她没有可靠的方法使她自己的成就与别人的成就联系起来，不管这些人是她的丈夫、孩子，或者是她所必然归属于的社会政治团体。

韦恩·鲍尔

韦恩·鲍尔是一位社会组织者，在加利福尼亚为“经济民主运动”工作。如今他三十五岁，但觉得自己目前的生活观是六十年代的产物。他说：“在六十年代，我们有一个梦、一个幻想，相信许多事情都会越来越好。那是一个个人成长、政治变迁的时代。令人激动不已的是，个人的变化，竟会导致国内政治的巨大变迁。”个人的变化包含与家庭的决裂，因为他那时看到的是家庭生活的空虚，而不是自己想望的东西。

1965年，十七岁的韦恩开始与家庭决裂，去寻找自己所想望的东西。他加入了海军陆战队，新兵生活结束之后，被分配到勒让纳兵营，然后就到纽约市度假。那时候，纽约的大学生上街游行、焚烧征兵卡，人们突然间有了政治意识，毅然站出来反对出兵越南。他和大学生朋友进行的辩论，最终使他对自己、对环境

的看法归于土崩瓦解，尤如对镜自顾时镜子被摔得粉碎。所有的价值、信仰、所有的一切全部破碎了。他突然感到自己毫无价值，陷入痛苦的孤独和迷茫之中而无人能助他一臂之力。原来曾深信不疑的人，实际上全在骗他。

当接到去越南的命令时，韦恩开了小差，然后改名换姓在全国各地转悠，一下过了八年的地下生活。1972年，他最终还是向军队投降，被送往一座军事监狱关了四个月，但却没被交给军事法庭审判，后因海军陆战队的大赦而被释放。他又回到父母身边，但觉得他们全然不懂他对生活的理解，于是又从新泽西搬到加州的威尼斯。

但是，韦恩和家庭习俗的决裂，并没有最终使自己退入对职业与私人生活的沉醉。通过激进的政治，韦恩重圆了曾经破碎过的生活之镜。告别过去之后，道德好象成了他的一个问题，好象希望用更为坚固耐用的材料重建过去的一切，政治能动主义就成了那种坚固耐用的材料。观察历史，就是观察拼搏演化着的文明，这能叫人热血沸腾、激动不已。但它也更多带有个人的情味，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进入这幅图景、这幅历史图景的过程，也正是一种斗争过程。六十年代中期，韦恩曾一度卷入邻居们与房东的争斗中。他说：“我觉得他们太受欺压了，房东总是占他们的便宜。这帮混蛋房东拿移民法当刀使，在人家头上晃来晃去，让人家整天过提心吊胆的日子。我对租户们的印象挺好。我确实喜欢这些人，他们是伟大的人民。”

组织租户的工作让他卷入倡导经济民主的运动。“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觉良好。我觉得自己涉足的工作可以直接给其他人造福。这又是一个价值问题。你可以用全部的时间聚敛商品赚大钱，也可以用它帮助别人一道工作，让人们协力同心、容忍不同意见，最后达到某种统一。加入他们的队伍可真叫妙、真叫人激动不已，因为你看到的是一种意识的进化。”

但是，这些刚刚解放的人能创造些什么呢？对此韦恩则语焉

不详。他说，他们会让社会“更好”。但“更好”指的是什么？他说：“我也许并不适合回答这个问题。”即使在他自己的专业领域，即在租户权力的问题上，对为了使租户和房东拥有同样的权力，应为租户提供什么具体社会设施，他也只有模模糊糊的看法。“只要在这个社会上不触犯法律、不搞破坏，我就有权住在这儿。这是特别敏感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私人财产和他人的权力、投资权力。你可以对它施加影响，你可以控制那种局势，可以赚一笔可观的钱，过上象样的生活。我想就是这样。我的上帝！我也不太清楚了！”

于是，韦恩对自己反对比对自己赞成的东西更清楚。结果，公共的观念，这维系他生活信仰的强大支柱，本质内容却是极为薄弱的。当论及公正的时候，他谈论的是个人权力、法律与政治体制，正是这些东西可能会让一个人具有获得个人权力的等量机会。当不同的个人以平等竞争方式对紧缺商品提出需求时，这些商品要以一定方式在一复杂的社会中进行分配。但从韦恩使用的语言中，我们看不出这些方式应为何种样子。然而，根据他的描述，正是涉身政治能动主义的做法扩展了他的责任意识。尽管他采取一些行动来确定他政治思想的内容和方向，他的政治论述至多也是部分地解释并发展了他关于公正和责任的观念。我们将会看到，他的问题是美国人的典型问题，既保守、又解放，也很激进。

同一传统中的不同意见

以上四人各代表一种美国人的意见。一旦相遇，争论就会在他们中间展开。之所以存在种种分歧，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出自不同的传统，下一章就来讨论这个问题。然而，在尖锐的对立背后，关于个人与社会、私人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人们的一致却也不可低估。这是因为，尽管差别颇多，他们却在某种程度上共有同样的道德语汇，我们称之为美国个人主义的“第一语言”，这和

我们大家都有的“第二语言”形成鲜明对照。

他们四人是否代表美国人的平均水平，我们并不怎么注意，我们更为注意的是如下事实：他们代表着美国人用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使生命富有意义的方式。布里埃·帕尔默在婚姻与家庭中寻找生活的意义；玛格丽特·奥尔德海姆则寄希望于治疗学事业。因此，他们二人关心的是私人生活。乔·戈曼积极关照城中居民而使生活充实满足。韦恩·鲍尔则通过献身于政治而获得类似的结果。他们二人都把公共世界深深融进自己的生活。不管主要考虑的是私人生活还是公共生活，所有这四位都热衷于关心别人。他们是富有责任心的成年人，在许多方面很值得敬慕。然而，若要各位使用个人主义的第一语言展开论证，他们就会嘴拙舌笨，很难表达其信仰的丰富多采。在其语言中，他们的生活显得比本来的面目更为孤立、更为随意，对此我们已经看到过。

所以，他们都假定幸福生活的目标具有某种随意性。对布里埃来说，幸福生活的目标是达到为自己规定的优先事项。但你何以知道，他目前的优先事项就比过去、或比别人的好呢？不过因为你直觉上感到它是正确的罢了。对乔·戈曼来说，幸福生活的目标就是从根本上献身于家庭和社会。但你又何以知道，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你的社团和家庭就比其它社团与家庭更好、更重要、因此就更值得你忠心不二呢？或者你乐于相信它们更好，至少于你如此。对玛格丽特·奥尔德海姆来说，幸福生活的目标，恰恰是把人们从乔·戈曼视若珍宝的各种习俗中解放出来。但你一旦得到解放，又以什么为目标呢？简单说来，你自己决定的一切于你最好。对韦恩·鲍尔来说，幸福生活的目标是积极参预政治斗争，以便创造一个更为公正的社会。但是，在所有人都有力量支配自己生活的社会里，政治斗争应该把我们引向何处呢？他们用那种力量去干什么呢？只要不伤害别人，想干什么干什么。